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走近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郁达夫:文人、战士与文化符号

■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余珺

文学是折射时代风貌的镜子,也是时代土壤培育的花朵。它映照出作家的信念理想,凭借其深刻性与普遍性也极易赢得跨文化的共鸣。

郁达夫,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奠基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选择以笔为戈,最终血染他乡,用生命诠释了中国文人的铁骨铮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郁达夫殉难80周年。前不久,由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郁达夫研究学会、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作家故乡杭州举行。

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导览”下,郁达夫的精神底色、文化贡献,以及其文学实践的世界性特征逐渐明朗,也引人深思:这位“书生”为何转变成了“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其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背后,有着怎样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基因?

抗战重塑“文人”身份

郁达夫的名字与中国新文学紧密相连。基于在中国小说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与鲁迅并称“双峰对峙的两大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研究郁达夫。他从丰富的史料中得出评价:在新文学进程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期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日记体文学作品《日记九种》等都是当时的畅销书,“消清不过地说明了郁达夫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同时,对于郁达夫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评价,学界一直争议较大。陈子善曾在郁达夫遇害60周年纪念会上这样讲:“他的自卑已极,淹滞风流,被贬为‘消极’‘颓废’,在郁达夫生前身后,都如影随形陪伴着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认为,郁达夫的小说“个性非常鲜明,和其他作家区分度极高”,同时也“风格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沉沦》《茫茫夜》《银灰色的死》《茑萝行》……的确,细数郁达夫小说中的角色,多描写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孤独、精神苦闷、既不满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只能在末了高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正如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总评郁达夫和鲁迅》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鲁迅的创作,是从“揭出病苦”“唤起疗救”的救世信念出发,而郁达夫的创作则是从献身艺术的真诚出发;鲁迅一心想做一个除旧开新的战士,而郁达夫只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

但若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恰恰可从郁达夫的身上窥见一代中国文人,甚至整个民族思想觉醒的过程——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1940)、阿尔贝·加缪的《鼠疫》(1947)、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男人》(1947)、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1969)……世界文学版图上,反法西斯题材精品不一而足。

“但中国的抗战文学和其他地区的抗战文学不太一样。”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邵宁宁观察到,欧洲的抗战文学“经常仔细地看对方、看敌人”,而中国的抗战文学,尤其是十四年抗战期间的抗战文学作品大多聚焦大后方的故事,“很少有描写正面冲突,更多是在书写自己。”他将这种文学类型归纳为“自省文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战



图为郁达夫旧居“风雨茅庐”内,郁达夫半身雕像。

本报记者 曹坚 摄



左图:《达夫全集》第六卷(1931) 中图:《沉沦》(1921) 右图:《日记九种》(1928)

争彻底粉碎了和平的幻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在邵宁宁看来,“抗战是触摸中国的过程,它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促成了社会结构的改造,也重塑了‘文人’的人格。”

其实,“零余者”不只属于郁达夫。柔石《二月》中的萧润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在社会的大转型中,不少作家都创作过类似形象,以表达自我内心的矛盾与苦闷,但他们又各有各的特殊。

比如,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淡雅的名士情趣不见了,精神色彩也不再消极悲观,取而代之的是掷地有声地写下“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3月,郁达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以战地记者身份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线;同年末,他应报社之邀,以“客死他乡的勇气”远赴新加坡,并在1939年至1942年间发表了大量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政论、杂文,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化名“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继续从事抗日工作,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民、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抗争——郁达夫的转变,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梦,每到春来辄忆家”,算着归期,想再看一眼故乡杭州富阳的鹳山日出,却在不久后遭到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至今骸骨埋葬地仍不知所踪。

他再也没能看到鹳山的日出。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抗争——郁达夫的转变,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再也没能看到鹳山的日出。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

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抗争——郁达夫的

转变,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血脉深处是悠久的传统

今天,郁达夫小说奖在业界声名显赫,《故都的秋》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家”郁达夫却是国内主流学界忽略的研究对象。

受时代因素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郁达夫在文学领域的评价并不高,许多中青年读者不知郁达夫何许人也。改革开放之后,郁达夫研究才上正轨。1985年,中国迎来首次大规模纪念郁达夫的学术活动。那时,距离郁达夫逝世已40年。

郁达夫的文学价值之所以回归公允评价,根本还是在于他的创作有跨越时空的魅力。

当我们谈论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时,叙事视角的选择十分重要。例如,口碑极佳的《南京照相馆》以受害百姓的视角直面战争惨痛,“平民历史”引起大众普遍共鸣。

郁达夫就是一位具有“人民性”的大众文艺倡导者。以人力车夫这一“五四”新文学中独特且普遍的文学形象为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为,郁达夫的《薄奠》和鲁迅的《一件小事》都突出了劳动人民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响:描绘了“劳动者的人性光辉”,揭示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以及造成悲剧的社会因素。

其实,即便是在早期,郁达夫的作品也不仅局限于自我苦闷的抒发,他的文艺思想早已发生演变。除了《薄奠》,他还创作了聚焦贫民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微雪的早晨》和《出奔》等一批以底层劳动人民为主角的作品。他身体力行着自己在《农民文艺的提倡》提到的要“亲自到农民中间去生活,将这一块新文艺上的未垦地开发出来……提倡这泥土的文艺,大地的文艺”这一思想。

“五四”新思想洗礼着郁达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流淌在他的血脉深处。

学界普遍认为:郁达夫的旧体诗与散文游记水平高于他的小说创作。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中国知识分子风骨,继承发扬着中国文学的传统。

比如,有学者研究,在旧体诗方面,郁达夫“九岁题诗四座惊”,一生从未停止创作,写下约600首佳作。《二十世纪诗词注评》中,郁达夫五首作品入选,与苏曼殊、柳亚子、夏承焘、俞平伯等人并列,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革命产物——白话的散文和小说——更易被接受,旧体诗一度处于尴尬又矛盾的地位。一方面,其形式是胡适所抨击的“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无法表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家大都从小接受传统诗文系统教育与训练,旧体诗是他们的文化基因。

很多新文学作家写旧体诗,却不愿意承认对旧体诗的“偏爱”。只有郁达夫并不推崇新诗,反而率性承认“骸骨迷恋”。“武汉大学教授李遇春希望通过研究郁达夫与‘新旧’文学的关系,为定位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提供新角度。

文化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的所思所想。

郁达夫为什么如此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并在迅速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后讽刺指出:敌人不但不能消灭中国文化,“将来若须建设东亚新文化,使敌国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这责任反而还在我们的肩上,同隋唐之际,我们去开发倭夷的情形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孕育了我们极其丰厚的自信自立的思想底蕴——也许,这就是答案。

纵观寰宇,古往今来,大家之所以为大,是因为他们的贡献超越了时代的局限。郁达夫,以及一大批那个特殊时代的文人身上,蕴藏着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自强、文明走向进步的精神密码,对整个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来说,都有永恒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我们呼吁以更辽阔的时空视野重新走近郁达夫,对其人其事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不仅穿透文字肌理读懂笔墨下的灵魂底色,更循着他的人生轨迹,追寻光辉的精神印记。



富春江边的富春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视觉中国

郁达夫与弘一大师:
从一次诚心造访开始

一于日光岩下,蒙赠以《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

不似西冷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

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

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

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从整首诗来看,郁达夫非常珍惜这次与弘一大师的见面。至于诗中述及逃禅之意,或许是其亲见弘一大师那超然一切、清淨洒脱的风姿后,内心有所感触。

赵家欣说弘一大师对郁达夫很生疏。真的很生疏吗?这次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见面,弘一大师与人见面一向不多言,并不意味着他对郁达夫很生疏。所谓“生疏”或许只是赵家欣的一种感觉。

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弘

时间往前,1936年10月15日,弘一大师在鼓浪屿致广洽法师函:

……附一纸,乞交高居士。又郁居士托代订《佛教公论》一份,乞仁者代付大洋一元交订,住址附呈。定单乞直接寄与郁居士。此费,俟他日晤时奉还。

所谓《佛教公论》,是否就是弘一大师与郁达夫见面时赠送的书?目前无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知第一次见面之前,弘一大师笔下已有“郁居士”这号人。

郁达夫离开厦门前,曾赴广洽法师素宴,即席挥毫录弘一大师语:“古诗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人生大事,岂可须臾忘

耶。丁丑元日录弘一大师语,广洽大和尚正 郁达夫。”

从现在可查得的资料中可知,郁达夫在此后还与弘一大师有过交往。比如弘一大师在1939年农历六月十六日致李芳远信中提到:“郁居士诗稿,无有存者。”这说明弘一大师曾有郁达夫的诗稿。1939年5月12日,弘一大师在永春致广洽法师函中又说到了郁达夫:“附致郁居士笺,乞转奉。”由此看来,弘一大师与郁达夫曾有书信往来。

从1939年8月7日,弘一大师在永春致觉圆法师的信中可知,郁达夫在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时还帮助过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在信中写道:“余之特别通

行证,已期满。乞向师部换取新者。乞访蒋百齐参议室主任,或张参议长皆可。又郁达夫居士致钱东亮师长之介绍书,亦乞交去。”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仍不忘在各地弘法。由于是战时非常时期,通行证由军方掌管,郁达夫出面向军方师长介绍弘一大师,亦可谓鼎力相助。1939年9月7日,弘一大师又在永春致广洽法师函,言感谢施十金;现住山顶寺方便闭关,性常法师等住山下普济寺;画集尚未着手;郁居士函收到,请代为致候等。

如今人们对郁达夫与弘一大师交往的许多具体细节知之甚少。好在弘一大师的不少书信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部分关键线索——由此可推断,郁达夫与弘一大师二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这份往来的起点,正是1936年底郁达夫那次满怀诚心的造访。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